

【199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研究课题】

以邓小平文艺理论 指导新时期贵州文学发展

何光渝 艾筑生

1995年11月

【199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研究课题】

以邓小平文艺理论 指导新时期贵州文学发展

何光渝 艾毓生

【内容提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涵着相当丰富的关于文艺问题、或与文艺问题密切相关的思想理论。自改革开放至今，贵州文学呈现出一种从久蓄迸发、高潮迭起，到渐趋迟缓、乃至逡巡滞留的起落轨迹。阻碍和束缚贵州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有外国，更有内因。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在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真正自觉地、彻底地以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导。唯此，才能促使贵州文学在本世纪末及下世纪之初得以较快地、健康地发展。

【提 纲】

题目

把握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新观点

- 一、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观点
-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
-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

新时期贵州文学的问题分析

- 一、与新时期同步发展
- 二、作家以群体出现并非偶然
- 三、改革的深入与文学的滞后
 - (1) 对文学生存环境变化反应迟缓
 - (2) 题材化势正在丧失
 - (3) 作家队伍出现结构性缺陷

发展贵州文学的几点思考

一、正确选择并把握发展的方向

(1) 加强理论学习, 提高理论素养

(2) 强调作家深入生活

(3) 要有明确具体的发展方略

强化“贵州文学”意识; 重构现实主义;
光大农村题材创作传统; 开拓城市题材创作领域;
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4) 努力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

二、在市场经济大格局中, 找准发展的有效途径

更新两个观念: 文学使命的新内涵; 市场经济与文学的关系。

(1) 重视创作资源的优化配置

(2) 强化保护作家权益意识

(3) 校正创作中“雅”“俗”辩证关系的认识

(4) 调整文学刊物的布局 and 构成

结语

中国正在走向新的世纪。中国的文学正在走向新的世纪。在这个跨世纪的
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版的三卷《邓
小平文选》、特别是第三卷，不仅是对于行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
多年的历史回顾，同时也是对未来世纪中国前途的展望和勾勒。这个理论深深
根于中国的实际之中，极富实践性，它是对新时代挑战的科学奉献和有力回答。
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同样是一种深刻的启迪和指导，其中包涵着
丰富关于文艺问题、或与文艺问题密切相关的思想理论。

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乃至在整个文化事业中，文学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事业发展与否，是文艺乃至整个文化事业能否全面发展的基础和龙头。它
以为时代和生活提供广阔而绚丽的史诗，为人生和理想架设精神的航道，塑造
高尚的审美情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
有精神，没有文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激荡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时代，这样一个
在进行着巨大而深刻变革的国家，这样一个正在全力以赴去实现富民强国现代
的民族和人民来说，则更是如此。时代和人民对于文学寄予很高的期望。我们
作家应该、也能够拿出自己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以鼓舞人民。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前提，我们考察贵州文学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并力图把
如何根据贵州文学的实际，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具体落实和实践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然包涵着邓小平文艺理论），以焕发更
的活力，促进贵州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也因此，在我们的论述中，将着重于对贵州文学（主要是小说创作）中所
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剖析，而较少论及已有的成绩。这并非是视而不见。

我们正遭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贵州文学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初的那一段轰轰烈烈之后，尽管它依然始终在运动着、前行着，不时也有一些
部的成绩和闪光，可是，从整体上看，贵州文学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仅
的一些变化，似乎也多是在外界（外力）的牵引和推动下发生、出现的。

由此，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进入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来的贵州文学，就整体而言，并没有真正自觉地、充分地、正确地
认识到，转型中的社会正在为文学提供着更大的表演空间和更为丰富的创作资源
也因此，我们的文学创作实际与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至疏离，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若干重大现象、矛盾和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问题，
有、或不能进入、或不能正确进入作家的视野，贵州文学失却了参与现实追
代的积极主动的姿态和行动。本来就应该具有强烈精神追求和深刻价值取向的
贵州文学，却恰好在这里显示出了自己的先天不足，乏力而孱弱。突出的表征就是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贵州文学几乎没有出现在全国引起重视或关注的重要作品和作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贵州文学的自我意识的强化，自省、自觉、自立、自强的过程当然也是曲折而漫长的。“新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不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州文学焕发活力的症结和关键在哪里？

把握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新观点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对于文艺领域也是完全适用的。繁荣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艺，首先必须有一支思想和艺术都是高水准的文艺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经济成分正以迅猛势头多样化，良莠并存的西方思想文化也随着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大量涌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带来思想文化的纷繁庞杂。如何始终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中健康、茁壮地成长？面对这些极为严峻的问题，我们应该作出正确的回答，而我们的理论基石，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精辟论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继承了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领导文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在总结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新的开拓，并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我们认为，必须真正认识和把握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几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才有助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艺观。

一、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观点。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活跃生产力，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 容。他早在1978年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

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还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他更是反复提出生产力的问题，强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还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才是我们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其中自然包括了文艺）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

应该认识到，文艺生产力就是文艺生产的能力和动力。马克思在使用“物质生产力”概念时，就多次同时使用了“精神生产力”概念。他说：“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恩格斯也说过：“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这些都说明，精神（包括文艺）的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交互渗透和互相转化。因此，我们认为，人们通常在说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时，往往只是针对文艺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作家艺术家）思想的解放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是片面的理解。其实，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实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涉及文艺生产对象和资料的建设，涉及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和接受对象（人民群众）的艺术生产能力的培育和发展，以及文艺产品质量的提高等诸多方面。这就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个体的事，而是需要与文艺生产直接有关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部门、文艺生产的管理部门、文艺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部门、以及包括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和接受对象在内的文艺生产者的通力合作。

因此，党中央曾明确指出：“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江泽民语）。“繁荣文艺是各级文化部门的中心任务”，“检验文艺领导工作是否有成绩以及成绩大小，根本标准就是看健康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是否繁荣。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部门长期出不了优秀作品，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搞得群众没书看、没戏看，就如同搞得群众没粮吃、没菜吃一样，这样的领导不能说是称职的，也是不会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李瑞环语）

我们曾经长期习惯于把“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香花和毒草”的唯一标准；对于文艺，虽然也曾提出过艺术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任何标准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判断文艺工作的标准也不例外。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艺形势，他曾经作了不少富于辩证意义的总体评价。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判断文艺创作形势的主要依据，就是文艺生产力；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解放文艺生产力；检验文艺是否真正繁荣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出了和出了多少优秀作品、杰出人才。也就是说，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思路，应该从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转到以解放文艺生产力、提高作家艺术家的精神生产积极性上来。

应该说，近年来，在贵州，文艺也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但是，怎样解放文艺生产力？怎样把文艺生产力的解放落到实处？尚有若干工作待做。“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指明了文艺生产力解放的根本问题在于文艺体制的改革。对此，在党的十三大以后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已经作了系统的论述，就是要从根本上理顺党、政府和群众文化团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能，特别是各级文艺领导机关的“衙门”作风。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为文艺创作服务的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认真地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排忧解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除了物力、财力因素的制约之外，仍然存在着把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放在什么位置、如何“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观念问题。这更是应该着力解决的。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的继承，也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偏颇口号的纠正。邓小平同志对文艺方向的新拓展，揭示了当代中国新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更科学、更准确、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文艺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二为”方向的提出，对于调动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潜力，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八十年代初期，贵州文艺得以长足发展，硕果累累，其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应该强调的是，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当代中国，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前全国人民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穿其中，使“二为”方向有了新的、具体的时代内容。因此，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实绩来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在这段话中，包涵着十分鲜明的辩证思想，应该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所牢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政治是什么？就是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最大的政治。文艺不应、也不能脱离这样的政治。邓小平同志对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从而在理论上廓清了长期困扰着文艺工作者（领导者和作家艺术家）的模糊、错误的思想认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观点。

这个方针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倡导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但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导下，这个正确的方针被片面地理解，甚至错误地曲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申了这个方针的科学意义。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和江泽民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多次讲话等文献中。在这些论述中，明确指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要加强并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充分尊重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倡导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一切思想上无害、艺术上可取、能给予人们以艺术享受和娱乐的作品，都允许存在；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要加快和深化文艺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艺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艺。

这些年来，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并一再告诫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坚持“双百”方针，这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断地为这个方针赋予新的内涵，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由此而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文艺创作起到强大的导向作用。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仅只体现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也不仅只体现在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方面，而且还应体现在文艺的对外开放上。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古代和外国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既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更要着重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创造。与此同时，这种文化，还要吸取世界各国和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应该有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胸怀和目光。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毫无疑问，“双百”方针还包涵着这样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使这一方针得以真正贯彻实行，就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起广泛的文艺工作统一战线。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即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号召“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

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和批评。”文艺要繁荣、要发展，如果没有一支团结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面旗帜下的文艺大军，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认为，上述三个观点，包涵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反映。这个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繁荣文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华民族文艺的极大繁荣而奋斗。其中，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关于贵州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一切思路，都应该以此，即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出发点。舍此，计将安出？

新时期贵州文学的问题分析

我们正处于一个澎湃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新时代。时代和人民对文学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期望作家们能够拿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事业注入精神和智力的动力。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应勉力为之的。应该说，贵州作家的创作，就整体而言，即是如此作为。这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仍须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只主要论及文学中的小说一类，也只主要论及其中存在的创作问题。文学的其他门类，以及贵州文学所有的成绩，将不在本课题中过多涉及。

一、与新时期同步发展

勿庸讳言，新时期的贵州文学，较之此前的贵州文学，的确有了令人瞩目的大发展。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或质量，无论是“纵向”地与自己的过去比较，还是“横向”地与周边省区比较，都是如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新时期伊始，以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乡场上》（何士光）肇始，贵州陆续出现了一批在全国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学作品，诸如长篇叙事诗《呼声》（李发模）、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叶辛）、《良家妇女》（李宽定）、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第一卷）、《大渡魂》（顾汶光），以及再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种包谷的老人》、《远行》（何士光）、《公路从门前过》（石定）；更还有一批作家，如雨煤、王剑、余未人、戴明贤、张克、廖公弦等人的作品，也在省内外产生了相当影响；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如伍略、苏晓

星、谭良洲、刘荣敏等人的小说，也屡次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贵州作家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旗帜，创作出了一大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作品，由此而使贵州文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的喜人局面。

在今天来反观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批足以在贵州文学史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印痕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大体都出现在拨乱反正之后、1979年初至1984年末的这一时间段中。我们认为，这并非偶然。其中，至少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些作品在其思想意蕴上，与新时期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随着政治上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不断解除着极左思想的禁锢，贵州文学界也进入了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思阶段，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思想解放的潮流一起，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贵州文学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在这里，起着最直接、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表的“祝辞”中，明确地阐明了其关于文艺发展的主要观点。由此而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新时期。贵州文学的新时期也由此而始。《乡场上》、《公路从门前过》等作品所表达的对农村新局面的由衷欢欣自不待言；《呼声》、《蹉跎岁月》等作品对反动血论等极左思想的猛烈抨击和批判也是显而易见；即使是如《天国恨》、《大渡河》这样的历史题材之作，其对反面人物刻划的深刻，也是在“文革”及此前的贵州文学创作中所不可能出现和达到的。

其二，这些作品在其题材内容及创作方法上，大体与贵州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既有着较为明显的继承性，又有了一定的拓展。这在短篇小说中特别显著。从历史地看，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内容的短篇小说，是贵州文学的一种特色和优势。二十世纪以来，二三十年代的蹇先艾，五十年代的石果，八十年代的何士光、定等，确乎都擅长于此，且因此而获得全国性的声誉。而以后二位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由于有了此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他们的创作较之前辈作家又出现了不少新时代的特质，有着浓郁的新生活的气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现出了十分明确的与新时期同步前进的特征。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新时期初始阶段，贵州文学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依相宜、应运而生，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

二、作家以群体出现并非偶然

新时期初始，贵州的作家即迅速以群体出现，并较突出地崛起于中国文坛。其中既有十年浩劫之后百业待举的原由，也是贵州文学人才久蓄厚积的历史必然。

其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机会均等”的文学创作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系列关于文艺发展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此时的文坛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坛，也是一个急需填补空白的

坛。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学的渴求，由于“文革”所造成的极端贫乏而在此时达到了极点，文学的“供”与“需”的矛盾，极大地刺激着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欲望。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极左思想的压抑摧残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磨难，原有的和潜在的文学人才已积蓄着相当的数量，并蓄势待发，新时期的来临，给予了他们最好的展露头角的机会。

应该看到，此时出现于贵州文坛的这个作家群体，究其文化背景而言，大抵可分为两类：一为在建国后就开始了一定的文学历练，而后因反右扩大化及“文革”等政治运动，惨遭贬斥于基层“摸爬滚打”的作家；一为在“文革”中蹉跎岁月、经受着“精神放逐”的磨炼，且有了若干人生体验的、有着一定文学素养和追求的青年。在百废待兴的斯时，这两类人，事实上是站在同一条文学的起跑线上。这种状况，与全国各地文坛当时的状况，是大体相似的。

自身有着较为充分的文化准备和生活经历，又遭遇难得的对于文学极度渴求的历史机遇，于是，贵州作家以群体出现于文坛，就是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二，贵州作家以深刻表现农村变革见长，这是贵州文学令新时期文坛瞩目的显著特征。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农村变革的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大多不出自京津沪等大都市中居文坛要冲地位的作家之手（尽管其中亦有曾被贬斥到边远农村生活多年者），而主要是身处边远地区的作家们的倾心之作。其中，以作士光为突出代表的新时期贵州作家群和一批以短篇小说为代表的作品，在当时文坛上，的确有着引人注目的光辉。

这成就的取得，当然也绝非偶然。贵州地处边远，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诸多原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也因此积淀了更为深厚的原生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农民文化的若干特征。而其中的若干痼疾，非有剧烈的大冲击、变革，方能有所触动，以改变微末。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作家，也因而对此有着格外敏锐的切肤之感，对农村中历来的种种人事行状认识体验尤深。这样，当新时期应运而至，大书特书此时农村变革的创作冲动和社会责任，就历史地落在包括贵州在内的一大批边远地区作家的肩上。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认识，以《乡场上》为代表的那一批表现贵州农村变革的优秀作品，无疑是时代的赐予，是贵州作家们“十年磨一剑”、蓄势既久后的喷发。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即：产生于新时期这一阶段、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乡场上》等一批作品，是否如今天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图解政治之作”？

我们认为，这就关涉到何谓政治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引述的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文艺不应该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但是，文艺是不可脱离政治的；而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彻底解放亿万农民的生产力，使农民摆脱贫困。如果说，那一批作品服务于这个政治了，那它其实正抒写了广大农民的心声，恰是为人民服务了。又何罪之有呢？问题在于，是否

“图解”之嫌？在我们看来，贵州作家们产生于新时期前一阶段的大多数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之作，都是出自心智的结晶，是作家正直良知的生动体现。更为重要的是，恰是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为他们提供了客观的时代背景，他们没有刻板地照搬生活，而是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使孕育已久的创作情愫与现实生活碰撞出火花，促使作家跨越了生活素材和原型，以更深沉更有力的文学形象奉献与读者。

其三，当我们今天反观上述文学事实时，我们便发现，其间既包含了新时期贵州文学得以一度辉煌的宝贵经验，也暗含着后来模糊了贵州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制约性因素。

如前所述，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贵州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这固可视为贵州文学传统的必然延续，但实则也是贵州作家准备不足的自然表现。即使优秀如何士光者，也为当时的文学评论界认为，他的一些作品“象《乡场上》那样虎虎有生气的还不多；有的篇什，失于平淡，有的作品，伤于沉闷；总的说心理分析缺乏节制，人物描写稍欠动态……”这里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在何士光此后不久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如长篇《似水流年》、中篇《青砖的楼房》等）中更是不幸言中，突出地表现为因不善于结构情节和细节短缺而导致作品十分明显的冗长、沉闷。

贵州作家的准备不足，还突出地表现为作品的思想深度方面。我们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简单武断地认为贵州的所有作家、或某位作家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思想深度。事实不是如此。但是，我们只要客观、冷静地与国内同期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比较，情况就不言自明了。同是表现知识分子在极左境况下的际遇，何士光的《草青青》、《青砖的楼房》、《似水流年》等中长篇作品，若与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比较，后者明显地表现出生活基础更为厚实、思想震撼力量更为强大的优势。同是反映农村的改革现实，叶辛连续发表的几个长篇小说如《拔河》、《基石》、《初澜》（为《三年五载》中的三部作品），在对农村改革中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的表现上，在对农村历史及现状的体察和研究上，大多停留于浅表，若与湖南作家古华的《芙蓉镇》、四川作家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相比较，则其思想意蕴的高下十分明显；同为“知青作家”，叶辛是写知青生活，叶辛的《蹉跎岁月》虽有较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后来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之后），但若与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相比较，则显出了思想纤弱和平面化的缺陷。李宽定的“女儿家”系列小说，在当时也较有影响，但如今认真反观，其题材并未摆脱“小女婿大媳妇”的窠臼，在批判封建文化和极左思潮对人性的禁锢和摧残等方面，作家只是浅尝辄止，而未能向更深的层面开掘，却把太多的注意给予了乡野民风习俗的玩赏。这种文化落差的反映，实际上并无助于我们贵州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而曾经以《天国恨》（第一卷）、《大渡魂》等历史小说显于贵州文坛的顾汶光，当时为历史文学评论界看好，却因种种原因，其《天国恨》续作长期“难产”，后不《百年沉冤》问世，反响颇好，却又因“下海”而中辍写作，致使其在历史小说

创作领域中已具有的重要性渐趋丧失，与同时起步的凌力等外省历史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以致令人无法言说……这样一批在贵州文坛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整体上展现出来的优劣长短，无不影响着更为年轻的一批批贵州文学后来者。目前的问题恰在于，在一些更为年轻的贵州作家那里，前者所具有的优长正在递减，而劣短却反而看涨。这才是真正令人忧心的。这正是贵州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一直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改革的深入与文学的滞后

在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取得成效之后，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迅速推进，以城市经济改革为突破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显然更为复杂、深刻、艰难和严峻。中国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转型期”。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

可是，我们的感觉是，处于这一“转型期”的贵州文学和贵州作家，尽管仍然继续在运动着、变化着，局部的成绩和进展也未曾间断，但是，就整体而言，始终尚未充分意识到“转型”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对于贵州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更未能真正自觉地去适应“转型”时代为文学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和空间，并充分地利用之。我们的文学的“热点”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错位。一些无疑是重大的反映着时代精神和现实矛盾的生活空间，甚至是一些就发生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未能进入文学和作家的视野。我们贵州的文学和作家，大体来说（当然不是全部）缺乏一种关切现实、追踪时代的积极进取的主动姿态和实践。即：改革深入了，文学却滞后。

当然，我们知道，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甚为复杂。但是，我们宁可这样来提出问题：同样处于“转型期”，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和困惑，为什么不少省区的作家创作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赢得声誉。而我们贵州如何？为什么彼能，而我不能？

对此的解释，也许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应该从文学、作家的自身寻找。

粗略地回顾一下，自新时期初期的一度辉煌之后，贵州文坛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确是相当重要的现象和问题——

（1）贵州作家对文学生存环境急速变化的反应迟缓。

国家经济体制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就逐渐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对于文学的影响，是由市场经济对文学的介入，从而引发了文学自身的形态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削弱或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化，宽容或刺激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和民间意识。虽然有过艰难而剧烈的痛楚，但是，从八十年代中

即开始了自然分化的新时期文学，到九十年代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多元空间结构，使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类型的文学，都获得了各自独立的空间，从而也使得新时期的文学在整体上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应该说，这个多元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对于作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在大致情况下，贵州作家对此的认识和反应是滞后的，并未抓住这个机遇，建构起贵州特色的文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贵州文学创作中的“慢半拍”现象。现象，源于文学观念上的滞后，源于对文学生存环境的变化缺乏认识 and 适应，其根本原因，则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模糊，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缺乏及时、认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结果是，新时期的贵州文学一度辉煌之后，面对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缺乏新思维的观照，惶惑不解，无所适从，很快出现了滞后于改革开放全局的态势。

(2) 贵州文学的题材优势正在丧失。

自八十年代中期始，改革的“重头戏”已经向城市转移。一方面，这是人民十分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对于擅长于农村题材创作的贵州作家，无疑是一个崭新的生活领域和陌生的文学课题。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贵州文学曾经拥有的传统题材优势逐渐丧失。贵州文学必须有新的起点。当然，我们并不以为题材可以决定一切，也不认为写非主流题材就不能表现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凡写重大题材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题材无区别。写什么样的题材何去写，固然是作家自己的选择。但题材确是有区别的。而且，正是在作题材的自由选择中，作家的艺术品位、功底和能力，才会无可掩饰地暴露出来。“杯水风波”题材的作品，如果不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时代的生活内蕴实质和发展趋向，其思想容量和社会价值显然是无法与高扬时代精神表现伟业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何况，即使是驾轻就熟的传统题材，也还面临着剧变的时代背景下，向更深层次掘进的问题。我们认为，恰好是在这里，贵州作家、特别是一些尚未成熟的青年作家，迷失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迷失了应有的正确方向和选择。

(3) 作家队伍的结构性缺陷。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短短几年间锐进的一批中青年实力作家，在厚积薄发中“迸发”了一批优秀作品之后，已经填补了此前老一代作家留下的空白，确立了各自在贵州文坛上的位置。一些有创作实绩者，也大多先后离开原来的或十分熟悉的生活轨道和环境，进入了城市，进入了专门的宣传文化单位从事专业或半专业的文学创作，有的还担负了相应的领导工作。文坛也因此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有序的状态。与此同时，更为年轻的一些文学青年，或因

历和积累的贫乏，或因此时正汹涌而至的各色文学思潮，正开始产生出某代、社会和人民相疏离隔膜的创作倾向，陷入甚至沉溺于纯粹“表现自我”区之中。贵州作家队伍出现了结构性断层。

应该看到，一些富有经验的贵州作家，已经或早或迟地注意到了客观与自身创作发展的关系，并开始在创作实践中作出了某些调整。可惜，也都未能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成名于五十年代的老作家石果潜心于百万长篇巨构《沧桑曲》的创作，试图以大的时空跨度和紧贴政治历史风云的再现当代贵州的沧桑变化史。但由于写法和主题开掘上少有新意，出版后引起必要关注。何士光此期间推出的“三行”即《苦寒行》、《蒿里行》和《葬行》，较之为其赢得第三次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远行》，文学语言更为新鲜，对于凡人琐事中所蕴含的情性文化特征的捕捉和针砭也不乏见地，但是，居初露于《远行》中的那种对社会进程把握失之浅表的缺陷，此时仍未能解脱。如《乡场上》般对于现实的痛切关注和虎虎生风的奋进精神，却渐次减退消遁。以写知青题材小说成名的叶辛（他后来于九十年代初高踞返沪），虽已在惯熟的知青题材领域中一时再难以深入，转而开始了城市题材的创作，求对自我的超越。此期间，他虽然仍以“高产”的创作态势称著于文坛，在多数作品，如《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发生在霍家的事》、《家事》、《欲》等，固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于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意识，也保持了可读性强的特色，但其对新时期现实生活及历史演进的体察和表现，能达到更深一些的层次。以写农村女性名世的李宽定，此时也试图“改弦”，创作了以当代城市青年知识女性为主人公的《浪漫女神》。但文学评论界颇有微词，也曾有报刊载文予以批评，称为并无厚实生活基础和深切体验的追“新”之作……总之，此时，贵州的老、中、青几代作家，无不在社会与文学观念的嬗变中，困惑，奔突，探索，寻找着跟上时代、走出低谷的道路。

此时，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与同时涌现于新时期之初的许多省外作家相比，贵州作家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国的影响已日见衰微，并呈现出某种社会进程的隔膜和认识理解上的无奈。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社会生活对于作家的创作作用，可以成为一种立影即刻见效的照相似的影响或约束。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某些素材虽积蓄了许久，仍无法使之获得进入创作，而某一偶然的生活瞬间，却足以触发起全部的创作欲望和激情。其中的心理当是另外的话题。我们在此所认识的，是当社会变革剧烈、传统题材优势渐衰，贵州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惶惑和不适应的状态。

历史地分析，这种惶惑和不适应，与当时我国文坛上主张“向内转”、“到文学自身”一类的文学思潮有关。如果说，我们的作家是把“回到自身”的主张，理解为摒弃过去那种把文学当做某种图解观念的政治宣传工具的错误学观，使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来，尊重文学规律，并对一些形式层面

面（如文体、语言、叙述等）进行变革，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符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所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可是，在贵州文坛上（当然不独贵州如此），一些作家和作品（以所谓“新生代”青年作家尤显）对文学的理解却另入一辙，视“回到文学自身”为避开、疏离时代精神和生活主潮，只要作品关涉了现实，就有图解政治之嫌，就有庸俗社会学之弊。于是，作家往往过分沉溺于表现“自我”，或醉心于贵族沙龙化的精神状态，或执迷于隐士不食人间烟火的闲逸散淡，或热衷于畸形、野蛮、平庸、琐屑的生活现象，甚至不以消解是非观念、道德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为“高品位”……一些作家作品逐渐失去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失去了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力量和美学价值。实际的结果是，一些在新时期之初起步、到中期创作势头看似不错的贵州青年作家，此时逐渐放弃了自己原本独特而正确的创作路子，追逐“新潮”，张牙舞爪，拾人牙慧，却始终只做了“先锋”的尾巴。这种创作思想导向上的偏颇，必然阻碍了贵州作家后续力量的健康成长和成熟，直接影响着贵州文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

于是，从总体看，1985年以后的贵州文学创作，不能不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没有再产生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家，也没有再产生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品。贵州文学回落于低谷之中，在全国文坛上哑哑了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看来，进入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无论是在生态环境、观念、功能还是在创作队伍的分合上，各种文体的盛衰上，都出现了与八十年代中后期迥异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被逐渐推向市场、面对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我们对此的认识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冲击并打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原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平衡态势；但另一方面，打破了旧有的文化（文学）模式，文学处于失衡状态，这正是建立起新的文化（文学）模式、使文学从失衡走向动态平衡的契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为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基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十分明确地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发展文艺生产力。由此，我们也应当明确，判断我们贵州文学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其中自然包含着文化力、国民文化素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为标准。或者，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担负起“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高使命。据此，我们不可能设想，用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能够创作出深刻表现“转型期”中国现实生活的优秀之作。贵州文学的生产力是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得到了解放并有所发展，则应该从总体的上加以考察，要看我们的作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何建树，在表现新的生活领域、塑造新的人物方面有何开拓，在增强艺术表现力方面有何突破，而最重

的，当然是要看我们的作家的创作思想、文学观念，是否自觉地用邓小平同志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全部创作实践。

由此出发，观察九十年代以来的贵州文学创作，虽然也在运行，也偶有或较好的作品问世，但确实尚未出现质的飞跃。贵州文学在整体上依然处于性文学的地位。

近年来，贵州文学的创作队伍日渐零落：原本为数甚少的专业作家中，以文学创作作为“专业”者已经锐减；一些原本坚持业余创作的作家，也因种种困，能问世的作品渐鲜，有的已经辍笔；部分发表过一些作品的青年作者，与文学“绝缘”；生活于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受浮躁世风的影响而缺乏文学素养的锤炼。贵州文学创作队伍正处于青黄不接之季，确实令人忧虑。

在创作题材领域方面，近年来亦未有较为明显的突破性开拓和进展：一传统的农村题材创作上，呈现出一种自足自满、故步自封的状态，在思想观少有认真扎实的探索，艺术形式及表现上鲜见刻意的追求和创新，整体上处境势，缺乏力作和精品。二是已在全国蔚为大观的城市题材文学，在贵州似乎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于贵州文坛的此类作品，数量很少，佳作更少，一些作者创作的这类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琐屑、小我恩怨，或极端情绪化地记事，或故作艰深晦涩虚饰矫情，非英雄、非历史、非崇高的倾向相当醒目，突出的是，若干出现于九十年代改革深化时期的新鲜活泼、错综复杂的生活比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现代化改造、经贸金融事业的异常勃兴面开放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均很少有作家深入涉猎，更无优秀之作出现。状况，既明显地远离了贵州现实生活的实际，也明显地淡薄了时代前进的强从而在整体上隔膜于全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拉大了与许多省区文学发展的差

这些，都再次暴露了贵州文学在创作实践中，与新时期急速变化的现实的惶惑心态和不适应的窘况。

对此，我们不妨再作一点个案分析。

雨煤是贵州文坛中擅长于农村题材，并真正坚持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领域行文学探索的一员骁将。其新作长篇小说《原情》，当是贵州目前自新时期对农村生活概括最为广泛、深刻的代表之作。作品与时代同步，表现出社会市场经济的“杠杆”，如何搅动了多年封闭沉寂的山乡，如何改变着农民们为常的生活轨迹和传统的道德、价值、伦理观念，如何改造着农民、特别是青年们的精神世界。应该说，作品在相当程度上贯注着时代精神，也有着引目的地域特征。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往往在一些情节和细节中，作家却不经意间地流露出某种惶然迷惘之感。在对于喜哥与三妹、与素贞、与桂花爱情纠葛的描述中，作家都恰到好处地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新农民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然而，在对人物行为的褒贬、特别是主要人物最后的处理上，却明显地流露了作家对于贫与富、金钱与爱情、现代生活方式与道德规范等方面，在价值判断上的不安和惶惑，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题材应有的震撼发聩的思想力量。